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FAZHAN DE GUSHI

张海洋 杨筑慧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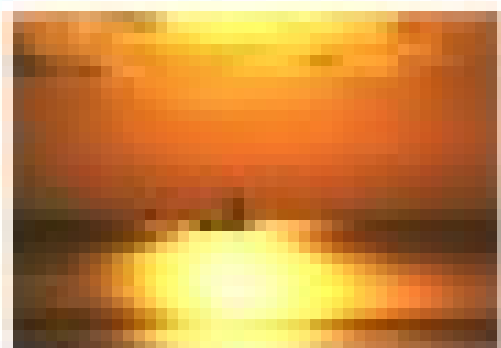
发展的故事

——社会实践与人性回归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推荐书目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

教育部推荐书目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

发展的故事

——社会实践与人性回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张海洋 杨筑慧 编

发展的故事

——社会实践与人性回归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展的故事——社会实践与人性回归/张海洋, 杨筑慧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6

ISBN 7-81108-207-1

I. 发… II. 张… III. 社会发展—中国—文集
IV. D6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1456 号

发展的故事——社会实践与人性回归

编 者 张海洋 杨筑慧
责任编辑 一 丁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4.25
字 数 36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8-207-1/D·81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民族大学“十五”“211工程”学术出版物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 理

副主任委员：郭卫平

委 员：王锺翰 施正一 牟钟鉴 戴庆厦 杨圣敏 文日焕
刘永佶 李魁正 朱雄全 宋才发 冯金朝 邓小飞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杨圣敏

副主任：张海洋

委 员：

邵献书 白振声 黄有福 徐万邦 包智明
王建民 王庆仁 陈长平 潘 蛟 丁 宏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总序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 1952 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 世纪 90 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 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

设。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了解和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研究的动态，将其最新的代表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

二、继承我院 50 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的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而努力。

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教材。因此，我们于 2000 年成立了“民族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础，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1. 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2. 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3. 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4. 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5. 本院教师实证性研究的论文集。

我们要求教材的编写者，应具有多年讲授该课程的资历，并且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论文。我们要求丛书中的教材和论著应参考并引用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我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本套丛书能够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50 年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术界中较高地位的确立做出贡献。

杨圣敏

社会前进、社区延续与人性回归

(序)

这是一本用案例和故事反映中国现代的发展努力和中国人民在社区层次上为发展付出代价的书。它的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6位硕士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通常不大可能正式出版，但下列理由使这6篇论文值得让更多读者来品读和思考：

第一，本书的6位年轻作者分别来自彝、回、汉、布依和景颇等5个民族。他们的选题包括广西古镇旅游开发、贵州水电工程移民、四川凉山黑彝地位变迁、云南景颇族遭遇毒品和艾滋病的状况和原因、宁夏回族农村牲畜牙行（经纪人）的实践知识、河南农村家族祠堂的重建等。问题虽然五花八门，但主因和主题都是一个：即发展的代价和实践主体的能动性。

中国各民族的农民和牧民、平地民和山地民，连同他们所在地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都在近60年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付出了诸多代价，这些代价换来了我们当前部分人享受的发展成果，而这些成果还有很多人却没有享受到。但是饮水思源，我们要知道这些付出的代价对于家乡父老、兄弟姐妹、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会有哪些意味和后果。中国今后还会发展，我们就是企盼在以后的发展中，国人都能有一种“代价和反思”意识，这种意识能使我们理解和珍重“和谐社会”的理念，明确“创新型国家”的含意和应该采取的行动。

发展的代价和反思还提醒我们：中国各民族的百姓和他们所

属的社区，从来都不是现代社会想象和现代话语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穷二白”或者无知无能无力。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要追求的生活目标和理想，也有实现这种目标的文化资源和行动意义。无论面对的是革命还是改革，他们都能针对当时的处境做出能动的适应，即用社区的传统文化资源和生活规则来应对发展的挑战，保持生活的连续性，这就是行动主体的能动性。本书在揭示发展代价的同时也显示出他们的这种能动性。他们的能动性并没有惊天动地之处，但这种能动性延续了人类的生物个体和文化群体两条性命，这就非同小可。

第二，本书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开展“参与式研究型教学”活动的成果之一。参与式研究型教学主张把高校的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把学生与教师结合起来，利用高校的资源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教师的教学和研究，让师生能共同参与社会实践和研究社会问题，提出有创意的分析和解释来回报社会和学科建设。在这种模式下，教师委托学生出面组织学术讲座，学生帮助教师准备教案甚至走上讲台，利用教师的研究经费在寒暑假做社会调查。教师则在这些活动中对学生进行全程指导，师生一起把社区田野当成课堂和拜各民族社区的报道人为师。最后，在相互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学生、教师和社区报道人共同发表研究成果，再把成果反馈回教室、学科、社区和社会。我们认为这种参与式研究型教学乃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央民族大学率先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采用“参与式研究型”的教学模式来培养学生和研究中国社会，乃是基于如下考虑：

首先，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各种社会政策法规都在逐渐完善之中。大学师生在此时运用学科和专业知識从事社会文化研究，反映现实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可以满足基层社区和高层社会两方面的需求：社区百姓的生活状况和心声能藉此

得到反映，国家社会的政策法规因此得到评估和信息反馈。往好处讲，这样做能为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尽一份心力；往差处讲，它也能把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呈现给主流社会，增加基层与高层、社会与社区双方的相互同情理解和配合意识，减少因缺乏理解和沟通而造成的种种不感和困境。

其次，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已近 30 年。30 年前，中国面对不发达状况和急剧增长的人口，采取了人口急刹车行动，针对不同民族和地域严格限定生育数量。现在看来，这次行动的成功是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标志，它预示了有此现代性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必定会快速发展，中国人生活水平会因此而迅速提高。但人类从来是既能解决问题又会制造问题的种群，并因之而产生一整套机制。

人口急刹车带来生活水平提高之时使中国社会出现四类人口状况：一是大量独生子女人群涌现，二是家庭核心化程度日趋显现，三是城市中的不婚人群和婚而不育的“丁克 DINK, double income & no kids”家庭数量大增，四是人的寿命大大延长。结果，目前的中国人口总量虽然没有明显下降反而略有上升，但这个人口总量不无泡沫。泡沫是说，中国人口主体部分已经处在年龄和性别金字塔结构的中上部，这些人口不能满足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能再为社会生育后代。近几年中国东部城市出现劳动力缺乏，可能是将来中国人口危机的冰山一角。

与此同时，近 30 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高校带来现实的挑战。当前中国大学生多半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固然健康聪明伶俐，但毛病也很多。如他们自幼受到太多的宠爱或溺爱而缺乏奉献精神 and 分享意识；他们参与实践不多，缺乏动手能力，也不太懂得尊师重道和尊老爱幼的道理。故此，大学需要对他们进行再次的社会化，即通过让他们接触实际，服务社会和帮助弱势群体来理解国家发展的沉痛代价和艰辛历程，强化他们的社会责

任感和悲天悯人情怀。

再次，中国学术的基础自“五四”运动以来受创至深且巨。重创虽不至于让中国学术万劫不复，但积重难返却是事实。目前国家和社会有志恢复，也要再过几十年和几代人才能见到成效。但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时不我待。面对这种需求和使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者别无选择，只能采用参与式研究型教学模式，在参与改革实践的同时培养学生和建设学科。

最后，我们主张实行参与式研究型教学还有如下考虑：当前中国学界的理论基础虽然薄弱，但中国的发展实践已经让世界刮目相看。我们的师生参与社会调查，总结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来跟发达国家对话，有助于我们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完善我国的社会政策。这符合我们主张的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应用原则，即“两个保护和一个维护”：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多元多样的民族传统文化，维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的权益；也符合我们主张的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建设原则，即“两个借鉴和一个创建”：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社会实践，借鉴国外的学科理论方法，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学科。

第三，本书的故事多发生在社区层次，由研究生从实地调查中收集。研究生的调查有粗细深浅之别，但总算能把生活中的一些案例收集上来并有所分析。这些故事并不能反映中国人为发展所付代价的全部，例如，中国还有牧区的生态困境，还有“两区”（经济发展区和自然及文化保护区）开发带来的当地居民生活资源受限问题，还有城市养老问题，还有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化印象，也还有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统计指标体系开发等迫切问题等。但读者通过本书的案例和故事，一定能够感受中国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里，各民族农村社区的平民百姓曾经有过哪些经历和问题，又怎样从社会结构和文化资源中找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这本身就是中国经验的组成部分。

本书中的故事及其主人公的经历，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面对现代化和发展压力时所采取对策的结果。这些对策在把中国带到今天的繁荣之境时，也使中国农民百姓付出的代价高于其他社会阶层或群体，特别是高于官员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国的农民百姓人数虽多，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社会里，他们手里能用来跟主流社会做交换和互动的资源却很有限。因此，他们特别需要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格外关注。

我们说中国老百姓跟主流社会互动的资源“有限”，不是说他们没有文化资源，而是说他们在社区中积累、维护和使用的某种资源跟我们在公民社会上所用的资源属于不同类型。类型不同的资源本来可以通过相互理解和交流实现沟通和互惠。但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从西方引进了民族国家、科学技术、计划经济等现代意识，后来又加上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因而变得格外强大。强大的社会往往自以为无所不能，所以就用简单的两元对立方法来给社区的资源贴标签，使之污名化。例如，我们认为我们所生活的城市社会是现代，民间社区是传统；现代社会代表未来，民间社区则代表过去；现代社会代表科学真理，民间社区代表封建迷信或愚昧落后。因此，至少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各种传统社区及其文化，包括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就一直处于被改造和教育的境地。结果，现代社会对传统社区形成了一种无可争议的支配性、优越感和霸权话语。

这种优越感和霸权话语妨碍了“我们”（特别是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理解“他们”（特别是传统精英和宗教职业者）在社区中用仪式和行动体现的生活意义。例如，我们其实至今也不知道中国百姓的民间民俗和地方信仰，包括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风水观念到底应该叫个什么名字和应该怎样去做分类和研究。可“不知道”却无妨于我们给它们贴上一个“怪力乱神”的标签，然后或祛除批判或放任自流。近现代中国的主流社会对于传统的

民间社区，一直就是误解多于理解，轻蔑多于尊重，批判多于研究，改造多于学习。这种误解造成三个后果：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很多口号和运动不能在社区扎根；二是现代社会与民间社区不能在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基础上和谐并存；三是平民百姓在社区层次上的经历和遭遇容易被国家和主流社会遗忘。

现代社会有着国家机器、国民经济和国民教育等资源，所以中国的孩子们将来肯定记得近代中国曾经有过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立宪运动；现代中国有过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民主改革、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化的经历。但由于民族民间传统社区没有这类资源，所以中国的孩子将来会记不得自己的父老乡亲在各自的社区里曾经怎样面对这些问题，理解和应对这些事件，又怎样想方设法将就着过那些年代。^①

现代社会习惯于把短期目的当作终极目标来提倡和追求，所以，它会觉得孩子们把民族民间传统社区的经历和记忆忘记光光也许不坏。但从长远看，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社会具有多元一体格局，所以社区的多元文化才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多元多样的民族民间社区文化小传统才是联接历史与现代，民族与国家和社会的关键环节。多元多样的社区文化和集体记忆中，才蕴含着中国长久和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因而才是中国人认同的基础和根本。任何试图埋没这些社区文化和集体记忆的社会运动和政策，都是摧残国家的人文资源、符号资本和社会软实力的运动和政策，因而也是戕害人性的行为。当然，我们坚信，这样的运动和政策不会久长，最终只能像大跃进、“文

^① 参见叶辛：《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化大革命”那样沉舟侧畔，作为深刻教训教材进入历史。但它给社会自身造成的伤害，最终也要借助于传统的和社区的人文精神来慢慢修复，正像中国当前的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中国的文化建设，我们已在《简论中国的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一文中略有论述。^① 中国的农村建设则与这本《发展的故事》关联更为紧密。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又遭遇内忧外患，国家忙于发展工业建设城市以求强国，因而对农村和农业亏欠也多。现在国家经济有了一些起色，想到拿些资源回馈农村也是报本。但本书6位同学提供的发展案例提醒我们：中国的农村建设远远不是建房铺路和改厕所那样简单。中国农村更需要重建的是社区共同体及其精神。社区共同体之于农民，恰如农村和农业之于中国。它不仅是社会基础，还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社区的重要性体现于人的“两条生命说”。

所有动物都有一条生物小命。生物小命短暂无常，只能靠生育延续。因此，人类也像其他动物一样看重物质、性和生育。但人类出生后要过一段漫长的发育期、生长期，停止生育后又有一段漫长的老年期。这些时日都不能光靠社会上的物质、性和生育来支撑，而要靠社区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以及精神来哺育、赡养。人类要在社区里开发出一条文化大命，这条文化大命就是社区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能使人感到虽然做凡俗事业却有神圣不朽之感，虽然自知少必有老生必有死，却能以老为贵以死为生。社区与人生因此密不可分。这就是人类生活的意义，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

两条生命论决定了“三种生产说”。恩格斯1882年曾在马克思墓前总结出两种生产说：一种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本

^① 参见张海洋《简论中国的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思想战线》2006年第2期。

身的生产。但我们现在知道，人类必须进行第三种生产，即文化的创造和传承，才能正常生活，才能使“小命”有意义和价值。事实上，所有动物都要从事前两种生产。因此，只有第三种生产，即社会制度和生活意义的生产才为人类所独有。人类社会生产和维护文化传统的单位就是多元多样的各民族传统社区，它包括各民族的平民百姓千百年来结成的各种血缘地缘和精神信仰共同体。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出版了他的垂世之作：《共同体与社会》。他的“共同体 Gemeinschaft”，在英语里被翻译成 community，在汉语里又被翻译成礼俗社区。他的 Gesellschaft，先被翻译为“群”，后来翻译成社会，现在的严格意义是法理社会。

滕尼斯辨析了社区与社会的区别：社区是本质意志的共同体，社会是选择意志的联合体。社区关系在人的理解中是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社会关系则是思想和机械形态。社区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人们把语言、习俗和信仰的组织叫共同体，却把职业、旅行、学术的组织叫协会或社会。社区是人们的意志的共同体，社会则是思维的共同体。意志共同体有现实或天然的统一，思维共同体仅有思想的或人为的统一。总之，“共同本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成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成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① 我们理解，它在说社区是道义共同体，社会是功利联合体。这些见解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区与社会关系都有启发意义。但最大的启发还有滕尼斯在第1版序言里讲的两句话：第一句是：“在历史和文化里没有个人主义，除非它派生于共同体并且仍然因此受到

^①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久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54页。其他间接引语见于5—146页。

制约，或者它创造并支撑着社会。”第二句是：“文化的天然的和（对我们来说）已经逝去的、然而总是作为基础的结构是共产主义的，现实的和正在形成的结构是社会主义的。”^① 这话有些晦涩，说白了就是：社区 community 有着更强的 communism 即共产主义的性质，社会 society 则只有 socialism 即社会主义的性质。

上面这两段话听起来是对现代正统意识形态的离经叛道，但仔细思索社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倒应该承认：传统社区的精神比起现代社会离共产主义的理想确实更近，我们曾经竭力破坏的传统的东西离我们要建设的目标反而更近，我们曾经要拼命建设的東西，却会使我们离理想目标更远些。如果我们不能兼容两者，就会形成一种悖论或怪圈。但如果我们真要构建和谐社会，这两者有没有什么矛盾呢？人的本性中既有物质和肉体需求，也有理念和精神需求。因此，真正的社会生活只能处在社区和社会这两者之间。我们在社会中寻求养人的资源，又在社区中寻求和培育“养神”的资源。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幸福指数”这种东西，那么我们也敢说，传统有神社区里中国老人的幸福指数肯定高于现代无神社会中的中国老人。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社会、社区与人性暨文化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运作模型：简单讲就是社会总是要前进，社区总是要延续，人和文化总是要回归传统自性。

这是因为现代社会跟现代国家一样，只能是一种现代构建，是一个单数概念。它由政府官员、文人学者和个人商人及个体消费者构成。它优先满足的，也是这些人的物质和功名追求。社区共同体则是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个多元的复数概念。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社区被国家和社会冲击得肢离破碎，但它毕竟有着更深的文化传统根基，因而也始终离老百姓的生活和需求更近。用

① 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久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6页。

最简单的话讲，社会可以由人员和物质堆积而成，只要社会上存在功名的利益，人群中的个体就会热心投身其中去追求他们的发展。相比之下，社区则不仅要有人和物，还要有“神”或文化传统。这种“神”或文化传统，才能向人提供幸福指数或满足感。

明白此理，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从长时段和大范围的角度观察，国家社会从古到今始终都是“现代性”的体现，它的基调始终是突破传统追求进步以满足人的个体需求。传统社区，无论是血缘地缘还是族缘或宗教信仰的社区，则与人性绑缚得更紧。因此，它的基调就始终是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保障人类生活的延续。它不仅要延续人的生物小命，还要延续文化大命，它不能像社会那样轻易“中断”和“割裂”传统。处于社会与社区之间的人性，则既要发展又要回归。在个体和肉体层面，人是亲现代和亲社会的，因为社会给人更多自由和机会。但在群体和精神层面，人却不能离开社区，只有社区才能安顿人的心灵，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只有在“山野”之中才能找到精神的慰藉，心灵的归属。这个貌似矛盾的运作模式就是我们解决中国社会当前所有问题的钥匙：沟通、理解、发挥和协调社会、社区和人性暨文化这三个实体的三种自性，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的故事》表明：能让社会、社区和文化 and 人性都能得到发展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综合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在多元社区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社区，就是当前中国发展和创新的最大主题。

张海洋
于中央民族大学